

# 秋忠和全国台联

## ——回忆我的先生廖秋忠

□ 詹志芳

今年是全国台联成立30周年，也是秋忠逝世20周年。《台声》杂志编辑邀约，请我回忆一些秋忠在全国台联担任副会长时的往事。我写下这篇文章以纪念这个在我生命中重要的人。

1946年1月14日，秋忠生于台湾嘉义县一户农民家庭，排行第五。大哥早夭，二哥是他尊敬的楷模，二哥功课很好，为了养家，早早就工作了，但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，念完了大学。两个姐姐只上过小学。下面还有3个弟弟，除了最小的早夭，另外两个也都念完了大学。

秋忠从小功课就很好，上中学时，家人希望他做个会计就很好了，帮他报了会计学校。可他想上大学，就自学高中的全部课程，1964年考入台湾东海大学英语系，1969年考上台北师范大学语言学硕士研究生。1972年他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深造，197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。在台湾念研究生时，秋忠知道祖国大陆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，非常兴奋，他认为这是一件大长中国人志气的事情。此时他也对祖国大陆心之向往。在美国求学期间，他和同学们组织了“国是研究会”，经常激烈地争论。他们还组织学习阅读社会主义书籍，组织合唱团大唱革命歌曲。甚至还租了一部电台，在每个周末的黄金时间晚上7点广播，开始曲是《北风吹》，结束曲是《可爱的祖国》，宣传社会主义祖国各方面的成就。编写出版杂志《柏城青苗》，排演话剧《日出》、《将军族》；上街游行抗议国民党的黑暗统治。

当时，中美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。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国才在美



上世纪80年代廖秋忠留影

国设立了联络处。1975年，中国驻美联络处组织了进步学生回国参观。那一次秋忠回到了祖国，还参观了大寨、大庆等地。当时，国内还处在“文革”之中，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秋忠回到美国后，就和同学们讨论，大陆这么穷怎么和台湾统一呢？我们有各个专业的人才，大家都回国帮助国家加快建设好，祖国统一才有希望。在美国文科博士念八九年的并不新鲜，秋忠只用了5年就念完了。他和我说如若不是搞进步运动，他还可以提前半年。

1978年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举国上下百废待兴，此时国家在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再次提出实现“四个现代化”。秋忠此时博士已经毕业。他和在美国的进步同学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，准备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。秋忠因为已经读完博士，就和同学们说：“我先回去，你们完成学业再来。”于是，秋忠与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联系。吕先生马上打报告给当时社科院的院长胡

乔木，语言所即通知秋忠同意他回国工作。临行前，秋忠托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回台湾告诉他的哥哥，他要回大陆工作。他哥哥非常不理解，李远哲对他哥哥说：“两岸都是中国嘛。”

1981年，全国台联在邓大姐、廖公的亲切关怀下成立了。廖秋忠热情高涨，马上把从台湾带出来的台湾少数民族服装捐给了台联。记得好像是1988年，秋忠开始担任全国台联副会长，那时他还同时担任台湾同学会会长及在社科院担任教学研究工作的，但依旧每周两次去全国台联。当时我家住在北京城东今天的东三环外，全国台联的办公地在北京城西，那个时候北京城连二环路还没建成，他每次去全国台联来回都要四个多小时。

他要带研究生，还有自己的科研任务；那时他还是六届全国政协委员；还是全国青联常委、台湾同学会会长；还是一本全国性专业杂志《国外语言学》的总编……社科院语言所的领导不愿意秋忠花费太多时间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工

作，他们所里的同事对他有时不能按时上交科研成果也比较有意见。

有一次，我看他从全国台联回来就睡了，实在太辛苦。我对他说：“你不要做那么多社会活动了，专心你的研究吧。任何一个单位也不会愿意让自己的人，去做那么多别的单位的工作。你们单位不说，并不等于就没有意见。”因为，我也是台盟盟员，每次去台盟开会单位也不愿意我占用工作的时间。尽管秋忠知道做这些工作会影响到他的本职工作。可他说：“我对台湾有责任。我有些优势，可以和海外岛内的学生沟通，这样对祖国统一有好处。”是呀，他在台湾念到硕士，在美国念完博士，对岛内、海外的台胞乡亲的想法很理解，知道他们想了解大陆哪些，并且有些共同的记忆，很容易就拉近距离。我父母也是台湾人，我无话可说。何况当时全国台联的几位会长、副会长年龄都已大，对他这样的青壮年更是义不容辞的。但他身体很不好，又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，就要花比别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。此后，我只能在心里担心，嘴上却再也没有说出来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秋忠担任全国台联副会长后，就没有完整地度过一次假。由于他在全国台联负责联络工作，每年的夏令营他都要带队。其实每年这时他都可以参加人事部专家司安排好的度假，不用为琐碎的事费心。他之所以要带队去夏令营，他常说自己从海外回来，熟悉情况，和来自海外、岛内的台胞乡亲更容易沟通。夏天本来就是身体容易透支体力的季节，那时他经常是，白天带队参观，晚上加班赶论文。因为在桌子前坐的时间太长，脚在拖鞋里没有动过，以致竟然脚面上全是痱子。我在家时，还可以给他端茶，送个凉毛巾，有时我上夜班不在家，他常常会忘记时间，一坐几个小时。我和他说，你不会把脚放在拖鞋上，再写论文嘛。可是说完，等他一坐下又忘记了。

他担任全国台联副会长时，常接待来自海外和岛内的台胞乡亲，有时候也没和我打招呼，就带回家吃饭。常常搞得我措手不及。记得那时候还是单休日，

每月休息4天，几乎都有客人来家里吃饭。平常上班的时候就更多了，有时我一下班看见几个朋友在家，还要赶快做饭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年代还是要用粮票的年代呀，买东西也不方便，回来再做好，陪人吃完饭，还要陪着聊天，等人家走了，我都快累瘫了。客人一走，他就坐到桌子前，做他的论文。我还要洗一大堆的碗，收拾厨房。现在想来，那些年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。

那时常是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学钢琴，回来还要督促她们学习，那段时间我的工作也很重，有些工作还要带回家来做。因为家里没有电话，全国台联一有活动要求秋忠参加就打电话到我办公室，因为我是做计算机软件工作，思维需要连续性，有时一天接全国台联几个电话通知，很影响我的工作。后来我想了很久，叫秋忠向全国台联申请一部电话，但他说，“如果为了电话、汽车，我就不回国了，这些我在美国都可以有”。

在去世前几个月，他在香港做访问学者。他在各国学者中用英文做了最近研究的介绍，中外学者听的都非常兴奋。有个英国的语言学家和他谈，“希望你尽快用英文把你的研究写出来”。他和我说起这些时讲：“中国语言学落后这么多，我要先给中国人看。我没有时间写英文稿。”最终他也没有时间把论文翻译成英文。前几年，我有事到传媒大学，碰上一位老教授，他说是教语言学的，最佩服的人就是廖秋忠。我就问他：“你认识廖秋忠吗？”他说：“从没见过。”我和他说：“我是他爱人。”他很吃惊地说：“你有孩子想上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吗？我可以帮忙。”我笑笑说：“没有，谢谢了。”后来，我送了他一本《廖秋忠文集》，他非常高兴，一个劲地谢我。

1986年，我们去海南岛休假，他看见海南的山山水水，想起了台湾。一路上都在和我讲，这树和台湾的一样，那树比台湾的小，台湾的水果什么味，海南水果味道比较淡一些……他想念台湾的感情溢于言表。尽管我的父母都是台湾人，可我那时候却从未回到过台湾，看着他兴奋的描述，我也想象着有一天

回到故乡去看一看。

1991年夏天，他刚从香港回来，就带着全国台联台胞青年夏令营去了福建。那年人事部专家司组织我们去青海度假，我又是一人带着两个孩子。到西宁几天后，他才晒得黑黑的赶过来。在青海湖边的篝火晚会他没有去，后来我想，他是太累了，不然不会主动休息的。青海度假结束后，台湾同学会在云南开会，他又赶过去。从云南回来，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，又坚持去参加了一个语言学的专业会议。这到他离世已经不到一个月了。

1991年的国庆3天，他一天也没有起来，都躺在床上。10月4日那天，他脸色很不好，我第一次陪着他去上班。他把工作的事情处理好，我就叫他的学生去请医生，医生看后说要立刻送医院，然而到了医院才发现一切都晚了。10月27日，秋忠因肝硬化腹水永远的离开了我们。

秋忠早年赴美求学，离开台湾后，再也没有回去过。我和他小女儿，在2007年，秋忠父亲去世后回台湾奔丧。我们把他的骨灰从八宝山公墓取回来，带回了台湾，带着他去了他5个兄弟姐妹家，然而他二哥到现在还在怪他不该回大陆，也不接受把他的骨灰和他父母的放在一起，我也就不再要求。虽然，秋忠不能和他父母在一起，尽最后的孝心陪伴父母。但我和女儿商量了，就把他撒在了我父亲的故乡宜兰冬山河里。我想秋忠知道的话也会同意我这样的做法吧。■



本文作者与丈夫廖秋忠及两个女儿